

从细节的方面解读近代中国

『“鬼子”来了』,意味着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与冲击

书问道



《“鬼子”来了》
杨奎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在杨奎松先生的语境中,所谓“‘鬼子’来了”,并不单纯是指侵华战争中占领中国国土的“日本鬼子”来了,而是从更加深广的意义上说的,是指挟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洋鬼子”来了;所谓“鬼子”,也并不单纯是对入侵者个人的统称,同时也是指一种文明。“‘鬼子’来了”,其实即意味着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与冲击。

与杨先生以往篇幅较长的专题性论著颇有不同,他的新著《“鬼子”来了》是一部专栏文章集结。因为是专栏文章,有些话题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在更深的层面上展开讨论,而且无法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结构严谨的系统;同样因为是专栏文章,却也深得不拘形态、灵活随意之妙趣,较之杨先生的专题性论著更具可读性。

在《“鬼子”来了》一书中,杨先生更多地是从细节的方面解读人生百态、观照世间万象的。杨先生认为,生产力亦即科技文化发展普及领先的地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必强,反之必弱,一个严重制约着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因素,首先是农村人口的过于庞大与农耕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比如,老舍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塑造的祁老太爷、瑞宣、瑞丰、瑞全、李四爷等一千人物,他们虽然生活在首善之区北京,却大都抱有一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面对“‘鬼子’来了”——国是你的,国家荣辱于己无关;家是我的,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得风气之先的北京市民尚且如此,边远农村的境况可想而知。清末民初的众多启蒙者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面对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怒其不争,尽管他们以唤起民众为己任,却未免有泥牛入海之叹。

正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现代文明的本质,不过是要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共同生活,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产生于陌生人密切交往的、城市公共社会生活场域之中,却与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宗法社会族群内部的血缘关系格格不入。所以,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农业古国,想在短时期内建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并通过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来结成以国民自由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无论如何也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现代国家,与日本入侵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尚且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传统国家,反而正是“东洋鬼子”的入侵和占领,才将一般国民的民族意识迅速激发出来。当战争直接侵害到普罗大众的个人利益,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方在国家有组织地应对现代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团结起来,并开始试着接受西方民主思想,而传统中国也开始一步步走向具有组织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进而初具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型。对于交战中的中日双方来说,这无疑都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

杨先生曾经一再强调,一个落后民族中的普罗大众,要想成长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国民,必定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极不平衡的过程,“中学”和“西学”,“民族国家”与“国民国家”,城市与乡村,精英与民众……其中既涉及到文明之间的碰撞,也涉及到国民性的种种痼疾。通过杨先生打捞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细节,以及由这些细节连缀成的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命题,我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和感悟。 王淼

来自亘古的宇宙目光

好诗注定是透明的语言,它自有混沌、丰沛的意义丛林

悦读



《二十亿光年的孤独》
[日]谷川俊太郎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谷川俊太郎,之所以有“日本国民诗人”的美誉,因为他本身就如“一抹绿洲”,一改日本现代诗的“荒野之境”。一位诗人或许能写出私人化的生存风格,但这个体的精神映像想得到广泛接受,又谈何容易。极好的现代诗,并不是梦呓般的不知所云,自说自话。相反,它是从极端个人体验里萃取出的一滴“精油”,能滋润人类的共通情感。谷川俊太郎的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或许正是如此。

单从题名看,它就远远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分野。作为中国读者,或许更能理解这种禅宗“瞬间永恒”的宇宙意识。他用最简淡的语言承载最幽奥的思想,呈现出惊异的感性密度和想象容量。如同译者所言,“易读”而“耐读”或许体现了谷川诗歌的特征。而在在我看来,他的诗歌的最大魅力,也可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真、纯、静、深。

这四个字呈现在诗歌里,就直接通向“宇宙的本体”和“语言的本位”。因此,谷川能够突破现代诗的众多主义、思潮和流派,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任何条条框框都没有羁绊住他的诗性智慧。活泼的生命在场欢愉、超越社会存在的宇宙沉思、个人身体意识的张扬、自然与心灵的感应都在他的诗句里缓缓流淌。可以说,谷川的诗就是生命借助语言抵达宇宙之境的最大尝试。生命是真实的,语言是纯粹的,宇宙是静默的,情感是深沉的。孤独、省思、同情和感动从未如此契合过。

你不得不佩服他采撷意象的跳跃、有力与丰盈。“爱是盲目的蛇,是扭结的脐带,是生锈的锁,是狗崽的脚脖”(《活着》)。只用四种意象拼合,就表达了“活着”背后包孕的诱惑欲望、生存延续、束缚衰老、流动变易。《世界》之中的时间体验更伴随着对死亡的静观,仿佛只有女人的爱抚才能忘却孤独。《关于爱》中的爱欲又被高度哲学化,时时反思着“我与异性的关系:我既是客体,“被导演”、“被命名”、“被结合”;又是欲望的主体,是“勃起的阳具”。

谷川对自然的多情感知,让诗歌充满着情趣和理趣。《鸟》就告诉你,行动远比“命名”重要,存在远比占有永恒。《世界的约定》则充盈着物哀之美,仿佛时间只从时间中产生。世界抽离了时间,给了你幸福的允诺:你活在了声音、色彩和气味之中。你也许会发现,诗人始终将宇宙孤独与人间爱欲结合起来,让“温柔盈满世界”。接吻“以比看和说更确切的方式,我们相互寻找”,它是“失去了语言,被净化的沉默中,而你只是呼吸着”。年轻人或许陶醉于诗人的“纯爱”,年老者也许感慨于孤独的老境。然而,谷川更打动人的则是想象力给情感的助燃。《天空》就如日本版的《天问》,那种追天问地的求索,对人类意义的探求让人悲慨。

在谷川俊太郎的诗里,你能感受到某种虚空的意义、隐秘的秩序。这或许是他给我们的最大慰藉。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看法过于“老派”,如今谁还在诗里寻找意义秩序?然而,好诗注定是透明的语言,它自有混沌、丰沛的意义丛林,只不过它不告诉你确切的指涉而已。《二十亿光年的孤独》正是一部精神深广又具普遍价值的诗集,既有日本古典美学趣味,又超越传统的诗学,开拓出一种“国际范儿”的新境界。 俞耕耘

并不是所有的尊严都可以剥夺

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血脉亲情,这是范根格安姆身上唯一不可被剥夺的尊严

好书我读



《古拉格气象学家》
[法] 奥利维埃·罗兰
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8月

许多人对索洛维茨基群岛的了解,只是缘于浮光掠影地浏览网络上的那些旅游宣传照片——那里曾是前苏联古拉格第一改造营所在地,也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反复浓墨重彩书写的对象。

相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位古拉格历史现场的亲历者,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则是古拉格覆灭多年后的局外人,但这并不表明两个人的观点相左,恰恰相反,越是发掘,罗兰越感到一种如同索尔仁尼琴当年那样个人尊严被剥夺殆尽的不寒而栗。

罗兰的故事是从“一本封面是云的画册,非商业出版物”开始的。在这本画册中,“有一半是他(气象学家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范根格安姆)从劳改营寄给女儿艾莱奥诺拉的信件复制品,他被捕的时候她还不满4岁。信件中有植物图集,有线条干净、天真、沉着的图画,用铅笔或水彩着色。里面有极光,有海冰、黑狐狸、母鸡、西瓜、茶饮、飞机、船、猫、苍蝇、蜡烛、鸟……标本图集和画都很美,但它们并非只为取悦眼睛而存在,而是肩负着教育目的”。

故事的铺展节奏带有明显的好莱坞大片叙事痕迹,不徐不疾,这反倒进一步加剧了读者对揭开画册背后“内幕”的强烈预期。事实上,他热衷的同温层气象研究也是对本书所描述的主角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范根格安姆性格的遥相呼应。

范根格安姆的本职工作是一位气象专家,体面而有尊严。在投入劳改营前,他常常会“看着无边辽阔原上的云卷云舒”,幻想着“在苏联整片领土之上建立统一的水文和气象部门”,他热衷他的同温层气象研究……他的工作单纯得无可挑剔,但就是这样,1934年1月8日晚上,范根格安姆本来和妻子约好在剧院入口的廊柱下碰头,然而,“就在离大剧场几百米处,范根格安姆被带往格别乌总部的‘内部隔离室’”。尽管指控他的理由丝毫经不起推敲,但同许多来到这里的人一样,在被剥夺尊严后,不得不把自己仅存的一点“能耐”让渡于妻女免遭骚扰威胁。

那里唯一能给他带来些许安慰的,就是偶尔他会给别人上些“关于‘征服同温层’的讲座”。就此罗兰进一步指出,“人最不能接受的,大概就是失去别人的认同了。”无论是范根格安姆“很受用”的尊称,还是罗兰这里所说的“认同”,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饱含人性温度的尊严。一个人正常而有尊严的存在,意味着域外力量对人性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反之,当一个人失去尊严,往往意味着域外力量的过度介入。之所以这里要特别提到尊严,是因为身处劳改营的范根格安姆唯一感到有尊严的,便是毫无用处的气象知识讲座,这样的知识“囤积”丝毫无助于高墙外面社会的发展进步,更像是打发苦闷。

也并非所有的尊严一定就可剥夺。在范根格安姆的身上可以看到,哪怕所有希望破灭,他仍旧穷尽所有努力,尽可能表现出一位父亲的尊严——他利用仅有的简陋条件,用书信向女儿传递着知识,也让纯净的亲情流淌在那一张张粗糙的纸张上。

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血脉亲情,这是范根格安姆身上唯一不可被剥夺的尊严。换言之,与其说范根格安姆穷尽所有努力捍卫着一位父亲的尊严,不如说他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抗拒,抗拒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力量。 禾刀